

# 荒谬的“宗教济世”

## ——析评《断头台》主人公阿弗季形象

陈 慧 君

吉尔吉斯斯坦当代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就思想内容的广阔性、艺术思维的开拓性说,都堪称独步前苏联近年文坛,因而我国大量地译介了他的小说,并得到了外国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他的长篇代表作之一的《断头台》,尤其引起过广泛的注意。只是给予肯定的多,对其具有的错误观念——宗教济世——的批评却很罕见。由于新近出版的两种高师外国文学教材中,均列有艾特玛托夫专节,笔者愿就此提出肤浅的认识。

《断头台》的主要情节,着重于揭露八十年代前后苏联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府的漠视,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颇具现实意义。然而,艾特玛托夫企图通过他所创造的“现代基督”,用宗教道德说教,以感化贩毒团伙、偷猎者、官僚主义者、贪求金钱而身心堕落者……的方式,去求得社会罪恶问题的解决,却是脱离现实的荒谬幻想。“现代基督”就是《断头台》的主人公阿弗季(一译俄巴底亚),他是作者宗教济世思想的化身,他的宗教活动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他的宗教精神统摄全书三个故事,他的宗教说教构成了小说的主旋律。

阿弗季以宗教革新家的面貌出现在《断头台》中。他是教堂助祭的儿子,笃信基督教(俄罗斯东正教<sup>①</sup>),在神学院学习时成绩优异,被视作当神父的好材料。但是,由于他主张革新基督教,使之“现代化”<sup>②</sup>,因而被学校除名,遂到共青团省报当了编外记者。从此,他在各地的采访、流浪生涯中,开始从事宗教革新实践。

阿弗季几乎没有什么个性特征,也没有什么个人欲望。他的全部生活,全部思辩,乃至全部情感(包括爱情),都紧紧围绕着他的宗教探索活动而设置,而展开。小说中描写的他劝诫贩毒团伙、劝阻猎杀羚羊群者的事实,是他以宗教济世的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他在昏迷中神游圣城耶路撒冷的情节,是他探索宗教精神奥秘历程的重要环节。聆听宗教音乐,为的是它能激发他的宗教灵感。他同主教辩论,同朋友谈心,为的是借此宣传他的宗教济世观点。甚至给恋人因加·费多罗夫娜写情书,他也完全为的是进行宗教说教。由此可见,阿弗季并不是一个血肉之躯的凡人形象,而是“现代上帝”的寓意性形象。

经过对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之后,阿弗季认为“传统的宗教已经变得过分衰老”,下定决心“寻找一种现代的新上帝的形式”<sup>③</sup>。对此,他在述说同神学院决裂的原因时,作了明确阐释:“……如果说历史能在世界范围内,把一个新的中心形象推到宗教信仰的前景位置上来——这个中心形象就是带有新神学思想、适应当今世界要求的现代上帝。”阿弗季还一再宣称:“我的教会,这就是我自己。我不承认教堂,更不承认圣职人员,尤其是眼下这号人。”寻找现代

化宗教、现代化基督,并不自阿弗季—艾特玛托夫开始,远在俄国革命初期直到十月革命期间,就有过造神派和“社会主义基督教”的存在,这实际是孟什维克分子的“杰作”,目的在于保存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根本对立的、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督教。经过列宁的批判,经过同苏维埃政权抵死较量遭到惨重失败之后,俄罗斯正教中的有识之士,公开宣布和号召教徒拥护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新的政治立场,也对传统的教义、教规作了些非本质性的改变。但是基督教教义的根本之点,即其思想意识始终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相对立方面,毫无改变。特别是宣称拥护苏维埃政权内外政策,却又把俄罗斯正教教会,作为苏联境内的一个独立王国。三十年代,它为了生存和发展,又搞过“真正的东正教基督派”等等的革新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又宣称进一步使之现代化,称为“共产主义基督教”,声称:用早期基督教精神重新研究教会的社会伦理观点,也就是强调基督教的原始观点;承认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但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承认社会和教会、教义、教规需要彻底改革使之现代化,但是认为教义是永恒的,是指导社会改革的基础,因而不在于改革之列。如此等等,所改革的实质还是在于保存基督教的根本教义。万变不离其宗,披上种种现代化外衣的“社会主义基督教”、“共产主义基督教”,还是传统的反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基督教。从小说的具体描述看来,它所说的现代化的基督教,完全是十月革命时期的改革和以后七十年间的改革的翻版再翻版,也就是仅仅摒弃传统的外化形式,换上“现代时装”,借以掩盖、保护、保存基督教的实质。加上作者说这是改造社会现实,涤荡社会罪恶和罪犯的唯一良方,因而,它较诸基督教原有各派更易愚蒙民众。

艾特玛托夫说他因出身而被定为穆斯林,但他不是伊斯兰教的信徒,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又说他的选用一个基督教徒作主角,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基督教产生了“非常强有力的人物耶稣基督”,与他这个无神论者邂逅相遇之后,“使他有理由去向当代人叙说某种隐秘的东西”<sup>⑥</sup>。所谓隐秘的东西,大约就是他所说的“人的世界本身的全球性弱点”,人们“自己可能做出的、可以成为可怕现实的事情”,也就是他所说的使他“激动不安的问题”:为什么青年们会染上吸毒的习惯?社会为什么会允许它存在?社会的允许它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家庭和个人原因?是什么和什么样的社会不完善因素把青年推到这条有害的道路上去的?等等。但是,艾特玛托夫在小说中并没有作出正确的解答,即这是由于苏联社会已经变质,已经脱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已经抛弃了无产阶级公共道德观念,苏联大地上已在大量种植罂粟和大麻,生产大量的毒品。他认为这乃是基督教教义和宗教道德观念没有深入社会,没有规范青年思想和行为的结果。由于认识的错误——其实,这是他的世界观方面的错误,他提出的解决社会犯罪问题的方法也必然是错误的。姑且不说苏联变质这一根本问题,就是他认为的不该对犯罪份子绳之以法,只应是以宗教教义,像耶稣那样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行动去感化他们,也是绝对错误的。艾特玛托夫还说“对入道主义作超社会的理解”该加以反对,“入道主义的概念也要比过去广阔得多”,但是,对社会罪恶和犯罪分子不予处罚,而以代其负责和作“替罪羊”的宗教济世去涤荡社会罪恶,“消灭”社会罪犯,只能是痴人说梦。

我国也有着这样的评论:艾特玛托夫塑造“自觉地背负十字架的精神使者”阿弗季,并非对宗教精神的追求,并不是宣扬和维护基督教传统,而是要真正地改造现实社会。这项论断同苏联评论家钦·侯赛因诺夫的看法基本相同。侯赛因诺夫说:“艾特玛托夫感兴趣的不是善恶对抗的宗教神秘的外壳,而完全是当代的社会冲突”;又指出“在阿弗季那里主要的并不是寻(造)神说的抽象概念,而是追求理想、善良和功勋的性格本身。”这是两者相同的方面。但是,侯赛因诺夫还说:

阿弗季反对残杀羚羊和使用毒品“的行动显得幼稚、冒失和轻率,但行动的特点本身暴露出他抽象概念和理想的不稳定性。”《断头台》于1986年问世之后,在苏联文学界和读者中立即引起了巨大关注和广泛论争。它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基本上一致的肯定,其内容却有褒有贬。褒的是它揭示了当代苏联,乃是国际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核灾难问题,并进行深刻的探索思考;贬的是它鼓吹以宗教说教济世救人。关于后者,也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宗教济世是“现代化”的改造社会的良方;一是认为这是想要把基督教传统、对堕落者的同情与多神教的、狼的(凶狠的、害人的)、实力的原则互相配合,实际上“似乎是在挑动恶毒的人采取恶毒的态度”。<sup>⑥</sup>

苏联文学评论家无论是肯定或是否定《断头台》,都认为艾特玛托夫操持的是基督教传统教义观念。甚至列·安宁斯基认为作者好象是在维护基督教的传统,他内心也符合基督教传统,并试图提高这一传统,把它作为自己的同盟,而且这传统甚或是基督教的传统,是多神教的传统。所以,据安宁斯基的看法,艾特玛托夫的“现代化基督教”,就连“社会主义基督教”、“真正的东正教基督教”、“共产主义基督教”……曾经要掩盖的传统教义也不加掩盖,只在口头上说要革新繁琐的教仪。我们知道,现代基督教有一种“解放神学”,它虽然也源于古代,可是在近代的印度,在现当代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倒真正是有助于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况且它本来就不是以宣传宗教信仰为目的,而是利用宗教对民众的强有力的影响,以动员组织民众投入斗争。正如恩格斯评说英国宪章派诗歌时指出的,为了动员广大民众投入革命斗争,革命诗歌中也不能不渗入宗教胡话。艾特玛托夫则是相信宗教胡话,然后才用它来影响民众,以至作为“良方”来“拯救”民众。尤其荒唐的是,他把犯罪分子说成“可怜的人”,他们都同狼一样,是忠诚、善良、勇敢的,因而是该拯救的,该像耶稣基督那样地去拯救这类可怜的人。

《断头台》鼓吹的“现代基督教”,倒底是不是济世良方?向犯罪分子宣讲并以身作则地去感化他们,倒底是不是济世救民新术?还有必要剖析一下艾特玛托夫的代言人阿弗季。艾特玛托夫说过:吸毒并贩毒的青年们“触犯了法律,受到了惩罚,但是必须帮助他们,我们有责任这样做,必须医治他们的病,寻找治愈他们的方法。”<sup>⑦</sup>阿弗季的言论、行动,特别是他们的思想,就是作者这段话的具体化。尽管教会和保守派教徒把阿弗季称作“异教徒”“叛教者”,他却自诩“在精神上仍然是个教士”,而且表示对耶稣衷心崇拜。他紧张地思考宗教问题时,设想过“人们的生活每天都在日益完善,一些今天看来是新的东西,明天就会变得陈旧;一些今天看来是顶好的东西,明天就会有更好的使之逊色。但耶稣说出的那些道理,为什么都从不显得陈旧;永远有其活力?”语气虽带设问意味,语意则不答自明:耶稣的教言乃是永恒的真理。正因为这样,阿弗季把耶稣奉为先师,竟然超越悠悠两千年岁月,立下坚决誓愿去耶路撒冷访师、救师。无论在任何宗教活动中,他都以先师耶稣所教所行为范型,时时处处大力宣扬宗教道德观,以之感化“迷途的羔羊”,俨然自居于现代人类的救世主的崇高位置上。

从阿弗季的宗教信仰主张看来,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实际上是俄罗斯东正教固有的分裂派中多个教派的大杂烩:反教堂派、救世主派、云游派、信基督派等等集于一身。它们认为任何世俗方法都不能拯救灵魂,只有耶稣基督才有此力量;教会、教堂、教仪全属无用,必须四处巡游,以自己的受苦受难,特别是代恶人受难,去感化罪恶之人;自己是“上帝的人”,是耶稣基督的替身……它们所反对的、所要改革的,都不是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它们倒是要发扬它。

阿弗季继承和发扬了基督教传统教义中的“原罪”说、救赎说、忏悔说的主旨,提倡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以身殉道,反对暴力抗恶,特别热衷于忏悔说的净化人的心灵以涤除社会罪恶的主张,

把它提到理论高度反复阐述。他在给因加的情书里说得很透彻:挽救吸毒、贩毒的青少年,“首先是忏悔。这就是我想向他们提供的一条出路。忏悔——这是人类精神史上伟大的成就之一”,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是一条日臻于自我完善的道路。”后来在旅途中,他又多次联系贩毒青少年的行为而思考忏悔的意义:忏悔是良心的值,是人类理智培植出来的值。他在其社会活动中,更随时随地实践忏悔学说,反对惩罚贩毒团伙、偷猎者集体……只要求他们忏悔,拯救灵魂。同样,“原罪”说、救赎说等传统教义,也被阿弗季奉为行动指针。《圣经·新约全书》说,耶稣基督为救赎世人舍身于十字架上,他就决心步先师后尘。他设法打入贩毒团伙,立誓以牺牲自己拯救毒犯。当他因劝导毒贩被踢下火车险些丧命时,庆幸上帝让他实践了一次“救世使命”。他身带重伤艰难地到达车站,发现毒贩们被捕而头目漏网,他竟不加揭发,甚至死乞白赖地要求民警也逮捕他。他认为这是十分难于求得的赎罪机会。对此,他写信给情人因加,说是“我为我今年夏天所承受的一切考验而感谢命运。”未过半年,阿弗季故技重演,以宗教说教劝导围猎野生羚羊团伙时,倒真的被成全了他效法先师耶稣基督的愿望,被吊死在老树上。艾特玛托夫没有嘲讽阿弗季,而是肯定他的以“现代基督教”的济世良方,救赎“可怜的人”(指各种犯罪分子),涤除社会罪恶。在这里,他没有正确地、甚至没有认真地探讨过产生犯罪的个人的、家庭的和社会的原因,只认为这是人性所决定,决定了他们是可怜的弱者。他偶然也提及那些犯罪分子的犯罪原因,是由于要完成国家下达的弄钱指标,但对社会的实质——崩解中的苏联社会制度全未加以揭示。谢·阿韦林采夫批评《断头台》,是由于在社会生活中遭受失败,有一股火气,它的不足并非我感兴趣的所在,令我感兴趣的是它反映出来的“文化总状态的征兆”,也就是用基督教文化去替代被五十年代起就毁损了的社会主义文化。

艾特玛托夫在塑造基督教新一代圣徒阿弗季的形象时,把他的重要经历、赎罪遭际,以惊人的相似性同耶稣相结合。例如:耶稣在髑髅地<sup>⑤</sup>遇难时值星期五,阿弗季被贩毒团伙踢下奔驰的火车,也在星期五;他在火车上、在山野里被凶殴、被折磨的情景,也同于《新约》里耶稣被审讯时的情景等等。作者如此描写,意在表现“师徒俩”在精神品格——为宗教信仰而献身方面的一致性。存在于《断头台》里的耶稣,是阿弗季形象的补充和陪衬体,因而大不同于《新约》中的原型,是作者大大地加工过的“改造体”。被彻底改变了的彼拉多审判耶稣的情节中,耶稣借反复辩白的机会狂热地宣传宗教改革主张,活脱脱地是一个完全同于阿弗季的“现代宗教”革新家和布道者。在洋洋洒洒四万余字的“神会”上,艾特玛托夫更让传统基督教的和现代基督教的救世主,精神上交相融合,形象上合二而一,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型救世主,这也就是要肯定阿弗季是“自觉地背负着十字架的精神使者”,是以耶稣基督接班人的身份来到现实世界的,从而赋予阿弗季以永生意义——现代基督以宗教济世必然千古永恒。

既然名称有“现代的”和“传统的”之分,阿弗季的宗教观念自然也同古代基督教会的宗教观念有些差异,“现代基督教”虽然对基督教教义毫无改变,可也作了些“新的”解释。阿弗季宣称他的宗教革新主旨在于:“克服多少世纪以来的停滞不前,摆脱教条主义,使人类在精神上获得自由,把上帝作为人类生活的最高本质来加以认识。”艾特玛托夫说得更明确:“我试图通过宗教完成一条通向人的道路,不是通向上帝,而是通向人!”<sup>⑥</sup>他还借笔下的耶稣之口,指出人类的“真正的历史是人性弘扬的历史”;“明日——上帝”、“无限——上帝”是新的人类,即在基督教精神中复活的现代人。基督教精神被艾特玛托夫视为:以广阔的人道主义去对待和“忠诚、善良、勇敢”的狼相同的、低下而可怜的“人”——犯罪分子。

为了阐明社会上只有着相一致的“人”的观点，艾特玛托夫写了阿弗季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馆听圣歌演唱，“突然悟出了一篇题为《六个和第七个》小说的含义”。一位契卡人员奉命打入白匪内部，在他的配合下，红军击溃了这股白匪，剩下匪首带同他在内的六人逃到国境线上，准备分头流亡。为此他们尽情高唱民歌，告别祖国。契卡人员拔枪打死六匪，然后自杀。阿弗季从而悟出它的含义是：民歌中的爱祖国的思想是他们的“共同信仰”，他们都是相同的“人”。艾特玛托夫对此作出评论：“……设若国内战争的悲剧没有变成民族悲剧，设若一些人抵抗历史的新进程，另一些人在加快这种历史进程的斗争中急不可耐，二者却又都没能从根本上使生活发生变化，那些出现在革命这块耕地上的可怕的犁沟又从何而来？那首格鲁吉亚叙事诗又怎么会有那样一个结局？”这评论完全是苏维埃国内战争的否定。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艾特玛托夫在答记者问时，强调他的杜撰这小说，在于要说明按基督教“不杀生”的教义，判定契卡人员打死叛匪，系“不道德的”行为，因而“他采用如此残酷的手段进行惩罚，以致在消灭他们之后，他发现他也消灭了作为人的自我——于是结果便是绝路和悲剧。”<sup>⑥</sup>小说中的阿弗季还在表示对“不可救药的世界”嘲笑耶稣而极为不满时，他“还想到，为什么唯物主义科学还没有把宗教学说坚决、果断地从进步与文明这一唯一进步的道路上消除掉？”这实际上是对唯物主义学说，即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嘲笑。可见，《断头台》所宣扬的“现代基督教”，是从基督教的传统教义出发，反对苏维埃国内战争、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宗教。它同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相比，有相似之处；可大不同于“共产主义基督教”，因为后者明确地宣布忠诚于苏维埃祖国、拥护苏维埃政权。当然，七十、八十年代的苏联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已经背离社会主义路线，但阿弗季并没有从这一角度揭示苏联社会的恶化，而是从宗教信仰的淡化，是从人性的沦丧去探讨社会道德败坏的原因，从而提出以广阔的人道主义——基督教教义“济世救人”。

艾特玛托夫在谈论《断头台》的创作时，说到他从别一位前苏联作家的作品领会到“今天除了人道主义别无他途”，以解决人类和文明社会的灾难问题。虽然他也说了“反对对人道主义作超社会的理解”，但是，他认为比过去广阔得多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只是超越一切信仰、目的和任务的“人类的生命”。当然，人类的生命、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人性是有的，人道主义是要讲求的。不过，人有善恶之分，对犯罪分子——如像《断头台》中的吸毒贩毒团伙、因偷猎而破坏生态环境的团伙、不择手段搞钱的贪婪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害的官僚主义者……就不应当从“人道主义”出发去宽恕他们，甚至代替他们承担罪责。也许这部小说还是有着一定的欺骗性，因而有论者称赞《六个和第七个》里的那位契卡人员的自杀，表现出为过去的流血而再次流血，是人的本性复归的一种循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惩处叛国贼而又自以为负罪，宽恕社会罪犯并代其承担罪责，竟被认为是人性的高度表现，是人道主义的光辉行动，那么，这人性、人道主义是何等货色，岂不容易加以辨识，偏偏又以为它是“济世良方”，岂非咄咄怪论。

阿弗季这位“现代基督”，前已说过他的“宗教改革”主张，是俄罗斯东正教几个非正统教派——分裂派改革主张的翻版。这里他所提及的人性、人道主义，又正是十五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宗教改革家所宣传的“人道主义基督教”的翻版再翻版。艾特玛托夫的《断头台》，也只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东施效颦之作，也多少效法了上世纪到本世纪的前、后现代主义文学。当然这只是指的彼此提出的“宗教济世”一个方面，其它方面则《断头台》未必比得上。因为上述那些类型的文学作品，大都能够明辨出社会罪恶的产生源于社会制度，能够判定是非善恶并不容忍犯罪和宽恕罪犯。就是在宗

教问题上,也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对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说、赎罪论等等,也有的不反对唯物主义的无神论。

在此,我们不妨忆想一下雨果创作的事例,重温一下列宁对托尔斯泰、高尔基的批评。雨果在创作《九三年》时,写了郭文因朗德拉克救小孩而被捕,给予宽恕放其脱逃,西穆尔登为此处决了郭文又自杀,正表明了雨果在人道主义和革命孰高孰低的问题上犹疑难决。列宁在高度赞誉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之后,尖锐地批判托尔斯泰鼓吹“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上自我完善”,说是“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sup>①</sup>。列宁又曾就高尔基创作的《忏悔》,批评高尔基同波格丹诺夫等人强调的“造神论”——即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相结合以济世——是极其荒谬的主张。雨果和托尔斯泰是有神论者,是民主主义作家;高尔基崇奉“造神论”时期,也还不是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赞成宗教济世和认为人道主义的高于一切是可以理解的。艾特玛托夫自诩为无神论者和无产阶级作家,还说他所塑造的阿弗季“乃是苏维埃的劳动者并不是宗教信徒”,就难于令人理解他何以也是推行“宗教济世新术”的可笑的人了。艾特玛托夫还比较过阿弗季和他的更早于《断头台》的别几部小说中的同类人物,说他们“极大地、紧张地思索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对一些人来说“是同信仰上帝有联系的”,但对“许多人来说上帝不是别的,正是道德、良心、自我意识的形式”;说他们相信上帝存在着,他们向上帝祈祷,实际上是通过存在于“我的意念之中”的上帝,向自己祈祷;说他们也是苏维埃劳动者,也不是宗教信徒;说他们是“自发的平民思想家,没有哲学的装备”。阿弗季与他们相同的有前三个方面,所不同的在后一个方面,即阿弗季不是自发的“宗教济世新术”的推销者,而是自觉的推销者,是有着系统的宗教哲学理论的“现代基督”。艾特玛托夫正是要借这位“现代基督”,以“通过宗教完成一条通向人的道路”,即以“比过去广阔得多的人道主义”作为灵丹妙药,感动和改造社会罪犯,荡涤和永远消除社会罪恶。可是,他要是仅仅属于“按照自己理想行事的幻想家”<sup>②</sup>,跪在先师耶稣基督的头戴荆棘冠、钉于十字架的圣像前默默冥想,倒也罢了,可阿弗季偏要在宗教迷狂的状态下,以激烈热炽的行动实践其说教,那么,艾特玛托夫精心塑造的这位现代“圣者”,给读者的印象只能是比唐·吉珂德还要唐·吉珂德的疯魔汉。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把人当成魔鬼;艾特玛托夫的阿弗季把魔鬼当成人。塞万提斯毫不留情地嘲弄唐·吉珂德,为的是让人们认识他的“济世救人”方式方法的荒诞性和危害性;艾特玛托夫极其慷慨地吹捧那个阿弗季,以诱使人们追随他的更为荒诞的、更具危害性的“宗教济世”道路。

就《断头台》的实际内容看,就阿弗季的实际言行看,艾特玛托夫鼓吹的“现代基督”的“宗教济世”良方,就是以对基督教——俄罗斯东正教教义的信仰,取代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它展示了前苏联崩解过程中的“文化总状态的征兆”:社会主义文化让位于基督教传统文化。因此,《断头台》和主人公阿弗季鼓吹的“宗教济世”,是荒谬的,是有害的,必须给予批判。

## 注释

①两种教材为国家教委师范司建议,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世界文学史》,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教材中的艾特玛托夫专节为笔者撰写。

②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起源于西亚巴勒斯坦,逐渐流传于罗马帝国,并于四世纪被定为帝国国教,从此成为封建社会的支柱和封建工具。其后,它分化为以希腊语区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区为中心的两派,1054年两派正式分裂。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称正教,意即保有正统教义的正宗教会。后者自称公教,即天主教。十六世

纪末,莫斯科都主教脱离受拜占庭帝国控制的正教,成立俄罗斯正教,并成为沙俄帝国的国教。苏联建国后,俄罗斯正教仍然存在和传播。(正教,又称东正教。公教——天主教,十六世纪上半期经过资产阶级宗教改革运动,分裂出来的改革派被称为新教。天主教、新教、正教,又都各自存在许多教派。俄罗斯正教,也存在许多教派。)《断头台》及许多评论文章,以及本文所说的基督教,即指俄罗斯正教。

③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孟什维克提出过“社会主义基督教”的主张,列宁曾予以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罗斯正教会宣称走现代化道路,称为“共产主义基督教”,提出一些革新主张,但其思想意识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根本对立之点,毫无变异,本文正文稍后将有揭示。

④本文引述的《断头台》文句,均采自李槐译本,漓江出版社出版,1987年第1版。

⑤⑦⑨⑩⑬据1986年8月13日苏联《文学报》载伊琳娜·里申娜《价值在于生命》;请参阅严永兴选译的《艾特玛托夫谈〈断头台〉的创作》有关部分。本段引文均出自此访问记。

⑥请参阅1986年10月15日苏联《文学报》:《小说的怪诞,还是认识的怪诞?!》同月21日苏联中央电视台:《关于艾特玛托夫的现实主义的思考》等等资料。

⑧《圣经·新约全书》说耶稣在古犹太国耶路撒冷的刑场“各各地”,被钉于十字架上死去。“各各地”系刑场地名亚兰语音译,字义为“髑髅”(死人的头骨)。

⑩引自《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载《列宁选集》第二卷。

⑫请参阅《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载《列宁选集》第二卷。

(上接第22页)

才华声望和远离京师、镇守西府的地缘政治条件,在调合今古文体之争中,逐渐熔铸成他自己关于文学创作风格、旨趣、标准的一套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他在梁代后期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并因此而奠定他在梁代中后期的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我们从裴子野“道达玄微,优游翰墨。行成师范,文为丽则”(《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的赞誉,和萧纲“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与湘东王书》)的推服中,以及当时京师所谓“议论当如湘东王”(《金楼子·杂记》)的时评中,都可以看到这点。

萧绎之前,刘勰、范云、萧统、刘孝绰、王僧孺等人,曾极力主张文质相应,古今并重而以通变为主。其中以萧统、刘孝绰的观点给萧绎的影响为最。萧统《文选序》“大辂椎轮和增冰积水”的思想和《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观点,在西府新文理论中不时可见。萧统很想在创作上达到这个标准,“但恨未逮耳,观汝(指萧绎——笔者注)诸文,殊与意合”。也就是说,萧绎的创作已经达到了文质相应的要求。刘孝绰也把“典而不坟,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全梁文》卷六〇《昭明太子集序》)作为文学创作成就的最高规范。萧绎完善和发展了刘勰等人的观点,形成了他的西府新文创作理论。当然,西府新文创作理论的形成与萧绎“叙情志、敦风俗”和“吟咏情性”的文学本体论思想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他关于文学本质的看法在创作理论上的具体再现。